

帝國民族與大革命

• 德拉諾瓦 (Gil Delannoï)

一 個人主義與帝國

人口學家鐸德 (Emmanuel Todd) 在幾部結合人口學與政治學的著作中，企圖在政治以外尋找對民族與民族主義變遷的解釋。他將文化傳統與政治文化聯繫起來考慮，建立了一個主要基於對十八世紀或者更早的家庭結構的研究模式，旨在研究家庭、血統、繼承類型，並衡量上述因素對民族文化的影響。

這一模式有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個人主義或社團主義 (Holisme)：或者是核心家庭，子女在成婚之後離開父系家庭；或者是祖系家庭 (Famille souche)，幾代人同堂居住。第二個層面是平等或不平等：繼承者之間或者平等或者不平等，根據長子權或者父母的選擇而異。交叉這兩個層面，我們可以得到四種不同的情況：一、個人主義與不平等；二、個人主義與平等；三、社團主義與不平等；四、社團主義與平等。

簡言之，這一模式可以引出很不同的類別，這裏簡要舉例來看：一、英國是屬於個人主義與不平等類型的；二、法國是屬於個人主義與平等類型的；三、德國是屬於社團主義與不平等類型的；四、俄國是屬於社團主義與平等類型的。該模式的原理還可以討論，但其引出的結果卻是很吸引人的。

按此，德國與日本屬於同一類型，因為其各自的家庭結構就有趨向民族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的先天因素，此兩國的風俗與心態中都具有權威與不平等的特性。此說為解釋法西斯的成因提供了另一個因素。

從另一個角度看，俄羅斯之所以趨向共產主義則源於其權威及平等的特性。同樣的，在個人主義的類型中，不平等的特點使英國適宜於自由主義，而平等的特性則使法國爆發了幾次普世主義的革命，個人主義的取向則使英法兩國遠離過度的權威主義。

如果我們遵循該模式的邏輯，法蘭西作為「個人主義與平等」取向的例子，應該是不適宜於民族國家的建立而更適宜於一種非民族甚至反民族國家的政治形式，這是民族國家史上一個令人驚異的現象。這種以個人主義與平等為取向

人口學家鐸德建立了一個旨在研究家庭、血統、繼承類型，並衡量上述因素對民族文化影響的研究模式。按照這一模式，德國與日本屬於同一類型，因為此兩國的風俗與心態中都具有權威與不平等的特性；而個人主義的取向則使英法兩國遠離過度的權威主義。

的帝國政治形式，似乎更適合於羅馬帝國與中華帝國。法國雖然符合這種帝國形式（主要在其本土），但法國革命則決定性地確立了現代民族國家的象徵。這是否表明上述家庭結構假設的破產？或是一種歷史的諷刺？因為歷史遲早會使這種單一而又過於宏大的理論模式落空。

不過，這一政治與人口模式仍然可以自圓其說：那些悖論式的結果所體現的，不過是偶然性的份量。革命時代的法國乃是一矛盾的民族，因為她游走於普世主義的意識形態與國家利益之間，此二者間的衝突及其延續正是法國的歷史特性。

這一革命難道沒有產生一個帝國嗎？這一帝國難道沒有推廣它的理念和其個人主義及平等主義風範嗎？法蘭西甚至在1852-1870年間又重建了一個第二帝國。儘管要避免那種決定論的和非歷史的解釋，但仍然值得探討這種意識形態的甚至風俗的普世主義和新出現的民族國家的理念之間的關係。法國平等的與民族的革命是按照一種帝國模式來進行的。當我們審視法國革命時，我們並非必然要將法國革命的意識形態歸因於家庭與法理結構，因為這僅僅是其中一個原因。帝國民族形式的帝國過去是、現在仍然是適宜於個人主義與平等主義意識形態的政治形式。

法國平等的與民族的革命是按照一種帝國模式來進行的。革命意識形態與民族激情的結合，使人們既為祖國也為政治自由而戰，同時也為保衛摧毀傳統社會等級制的革命成果而戰。祖國成為了「民族」。帝國時代將啟蒙理性與浪漫情懷兩種截然相反的理想結合起來，這也許是民族國家形式為甚麼能佔主導地位的原因。

在法國革命期間，啟蒙哲學中並無民族的內容。革命意識形態中出現的民族旋律是同浪漫主義和音的。在革命戰爭的關鍵時期，提出民族的象徵更能激起民眾的愛國熱情，這比當時革命哲學中的抽象概念要明白易懂得多。革命意識形態與民族激情的結合，使二者都得到了極大的強化：人們既為祖國也為政治自由而戰，同時也為保衛摧毀傳統社會等級制的革命成果而戰。祖國成為「民族」，因為它鏟除了特權，而民眾同時行動起來反對好戰的外敵。他們在瓦爾密戰役^①中既是愛國者又是革命者。正是這種革命與愛國的結合，使得當時的愛國主義不可能是仇外的，認同革命思想的外國人不是敵人。

拿破崙帝國借助普世主義的意識形態將革命的防禦性的勝利變成了共和國的進攻，並進而將之作為帝國擴張的工具。拿破崙並非完全的偽君子，他確曾想推廣革命理想，但隨着帝國的擴張，革命漸漸失去其內容。

帝國的形式也許較適宜於啟蒙理想，它應該是一個更為溫和、寬宏和包容的帝國，但拿破崙帝國卻太具進攻性。當時確實應該打破王朝政治，但卻應該尊重各國人民的自決權，而不是以一個科西嘉家族取而代之。

以上設想自然不足以強化當時的帝國，但卻有助於顯示普世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內在矛盾。如今帝國時代自然是一去不復返了，因為帝國時代將啟蒙理性與浪漫情懷兩種截然相反的理想結合起來。這也許是民族國家形式為甚麼能佔主導地位的原因，即使是在個人主義與平等思想取向的民族也是如此。然而，也正是由於這一原因，使民族國家自身隱含着緊張，這是最具決定性的因素。法蘭西民族的某些帝國特徵（包括文化上的），也可以從這個角度獲得解釋。

自1789年以來，法國民族主義一直是強烈的，但經常是限於少數人的。這一特點既由於法國革命遺產中存在着反民族主義的傾向，也由於民族主義經常起一種反對派的、消極的作用，因而總是受到另一派的批評和指責。由於同其

超民族主義對手的不斷對抗及同帝國取向的內在衝突，法蘭西民族主義既被激活又同時處於弱勢。如果以上假設不錯的話，那麼此類以帝國及平等思想取向的民族則是一種愛國自負的民族，而非種族歧視的民族。

二 帝國型的大革命

從歷史長程看來，大革命總是同一個民族的歷史相聯繫的。歷史雖然不能完全解釋一場大革命，但卻可以提供一些有意義的提示。我們這裏所謂大革命，是指那些以徹底改變社會甚至人性為宗旨的革命。這種大革命號召全世界並希冀成為模式，這類革命最具普遍性和抽象性。為了創新，它可以有更大的破壞性，至少革命的藍圖如此。1789年的法國革命和1917年的俄國革命便是此類大革命的範例。

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和十八世紀的美國革命，不論從歷史規模還是從民主和自由主義史上的作用來說都是偉大的，但這兩次革命首先是只有國內意義的、區域傳統的激進改革，二者都不徹底廢棄傳統，甚至以保存某些正在消亡的因素為目的。

無論是美國的民主政體還是英國的君主立憲，兩者都有一個以上的民族或者種群共處其間，致令普世主義的政治追求受到局限。比較英屬殖民地和法屬殖民地的區別，我們可明顯地看到這一特點。英國人並不要求其殖民地民族遵循某種普世主義的教條，但法國人則正相反。英國人更傾向於經濟帝國主義而不是政治同一。

1789年的法國革命是一場反對社會等級傳統的革命。同英美革命不同，法國沒有自由主義與民主的傳統可以依賴，以偉大的普世性理想作為號召不僅是有利的甚至幾乎是被迫的。當時法國是歐洲最強大、人口最多的國家，她在政治上與知識上對歐洲的持久影響，將其導入普世主義的追求而非對基本民族利益的保護。索邦大學曾是中世紀的大學府，基督教十字軍東征的動力來源於法國。在基督教的歐洲，法蘭西被認為是「教會的長女」。在政治上和藝術上，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同樣光耀歐洲。在整個歐洲大陸，法國曾是被模仿的對象。如果說啟蒙主義誕生於歐洲俄國並流行於全歐的話，那麼以伏爾泰為代表的法國哲學家與作家則是主導，法語也是其時歐洲的語言。

法蘭西的帝國民族的歷史，使革命趨向於一種理想主義與平等主義的大革命，而革命又反過來加強了這種普世主義的取向。正是因此，法國革命乃成為一場充滿了抽象理論話語和藍圖的運動，這也是其光芒遠布的原因之一。一夜之間廢除特權，向全人類宣稱確立個體權利，法國革命的這些偉大成就震撼整個歐洲，甚至遠播外域。夏多布里昂 (François René de Chateaubriand) 指出，法國革命為世界歷史不可思議的中斷，歷史主義從此確立，各個領域都留下了革命的印記。甚至在音樂領域，法國革命也引入了斷裂，如逝世於1791年的莫扎特的音樂世界同貝多芬的區別。在革命前，波拿巴的成功和黑格爾的哲學都是不可想像的。

我們這裏所謂大革命，是指那些以徹底改變社會甚至人性為宗旨的革命。這種大革命號召全世界並希冀成為模式，這類革命最具普遍性和抽象性。為了創新，它可以有更大的破壞性，至少革命的藍圖如此。1789年的法國革命和1917年的俄國革命便是此類大革命的範例。

法國革命的偉大同時也是它的弱點。奠基於普世主義的信條、同一語言和中央集權的帝國的建立是緩慢的，迅如閃電的法國革命帶來了混亂、烏托邦和幻滅，政治冒險達致一個恐怖時代。從英國自由主義出發，柏克(Edmund Burke)自1790年就批判法國革命，他明智地看到了政治抽象的危險。1792-1794年的恐怖時代證明了他的擔憂。康德與黑格爾起初對法國革命讚美有加，後來則持分析的態度。儘管原因不太一樣，但他們都肯定法國革命的普世精神，而否定其政治專制冒險的一面。

法國革命迅速演進的各個階段為今後革命提供了可能的發展方向：從君主立憲、議會共和、革命專政、集體政府再到古羅馬式的執政府和帝國，在革命手段上也是從三級會議陳情書到選舉再到陰謀和恐怖。

雅各賓派遇到的困難也顯示了革命所面臨的平等問題的障礙。雅各賓派的主要問題是既要解決社會不平等，又要遵守剛剛宣布的人權規範。雅各賓派所施行的方法對法國影響甚深，他們加強了中央集權，利用過一些民族主義的口號並曾對全體人民發布呼籲。他們當時雖沒有來得及實施普選，但拿破崙的威權卻是部分建立其上的。

雅各賓派曾經有過以權力控制經濟和使用政治暴力的傾向，如強制規定某些產品的價格(如某些穀物)，但他們卻沒有按照一些平等主義思想家的學說(如Roux、Dolivier)重新平等分配土地，小土地所有者屬於他們政治理想主義的一部分。從恐怖主義手段來看，革命決策者之間曾為爭奪革命的領導權而使用過恐怖手段，但雅各賓派一直無法控制恐怖時期極端的和自發的暴力行為；他們利用人民軍鎮壓旺代的反革命力量，但卻沒有政治軍事化的概念；他們創立了國民革命軍，但卻沒有意識形態化的軍事組織，更沒有後來托洛茨基的紅軍的概念。

一個世紀之後，當新的一次大革命開始時，俄國並沒有馬克思主義革命的土壤，因為馬克思認為這一革命應該發生於最富裕和最發達的國家。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假如我們的假設成立的話，俄羅斯的帝國民族及其文化的特性使其適合於進行一場平等和理想主義的革命。俄國的專制傳統較強，生活方式不重個體而重社團，農奴制的後果仍很嚴重。這些不同的特點可以說明俄國革命為甚麼具有威權的傾向，但俄國思想史及其理想型的社會主義、俄國十九世紀對法國文化與語言的嚮往等，卻又表明俄羅斯有同法國共通的一面。

俄羅斯是另一個帝國民族，它曾經歷了卡特琳娜二世的專制，而卡特琳娜二世又對法國啟蒙思想推崇備至。俄國當時具有接受普世與平等主義的土壤，社會主義被認為是傳統社團主義和現代個人主義的調和劑。

總結一下，剔除時代與境遇的區別，帝國民族有以下幾個共同特點：共同語言、中央集權、儒生(Lettrés)官僚系統、軍隊處於較次要地位以及對商業及現代自由主義經濟的輕視。

如果沒有文學、思想和思想家的傳統，沒有政治的策劃與組織家，平等主義的大革命就會受到局限，當時的俄國具有所有這些條件。革命前的俄國文學具有世界性的影響，其繁盛可與十八世紀的法國相媲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革

俄羅斯是另一個帝國民族。俄國的專制傳統較強，生活方式不重個體而重社團，但俄國十九世紀對法國文化與語言的嚮往等，卻又表明俄羅斯有同法國共通的一面。除時代與境遇的區別，帝國民族有以下幾個共同特點：共同語言、中央集權、儒生官僚系統、軍隊處於較次要地位以及對商業及現代自由主義經濟的輕視。

命危險性的預言者，托爾斯泰是典型的世界主義作家，但又對將來與進步存有懷疑。

按照我們對平等主義的大革命的界定，法國與俄國之間一定存在着共同點。在上述兩種情況下，革命者本身並不能掌握平等主義的尺度，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實踐上，他們都不知道如何解決社會問題。二者之間有一些共同的行為方式，如在領導層與人民中間開展清洗運動，指定一個內部敵人，但也有相當不同的地方。在法國，政治比經濟更具決定性；在俄國，布爾什維克正是以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的名義廢除私有制，取消人權並宣稱自己是唯一的科學的政治制度。

中華帝國的歷史、中國的共產主義制度和毛澤東的一系列的革命嘗試，表明中國革命是這類普世主義帝國類型的第三次大革命。為追求更多的平等，歷次的革命都採用強制的平等正義，由於歷次都未達到平等的目的，因而革命便日益趨於激進。

傳統的力量從來不是決定性的，但要擺脫它卻並不容易。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曾指出，法國從舊制度一直到大革命後的各種連續性：政府權威、官僚集中制、行政體系、知識份子的作用、對經濟自由的不尊重等，始終都沒有改變。在帝國民族那裏，突變壓倒漸變的原因也許來源於改革之艱難，政治、行政及知識精英們在革命過程中比在自由發展過程中更容易控制局勢。一旦新的精英階層掌權，他們自然樂得利用原有的帝國文化與行政架構。

因此這種類型的革命得益於一些帝國取向的民族特點，而革命又反過來加強這些特點。拿破崙帝國並非無源之水，而共產主義俄國以多民族為名建造帝國並以反對美帝國主義為名在世界上以帝國方式行事，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釋。

古羅馬及中華帝國本身的普世性自然不及它們所宣稱的那樣強烈，但在長期的歷史演進中，通過語言、文學及行政傳統，帝國確實獲得了統一。在民族國家的時代，帝國因素往往成為障礙，但由於傳統的持續，由於創建現代世界的願望，同時又由於民族歷史的印記和對世界將來的把握，這種帝國因素誘發了最具雄心的革命。這類大革命既想改變政治又要改變人本身。在法國，革命恐怖時代之後，這種雄心一直受到內部的制約，包括兩個拿破崙大帝的政治現實主義。在俄國，共產主義制度一直走到了其設計的最後階段，但經過70年的實踐之後走向崩潰，徹底放棄。作為一個古老的帝國民族，中國也經歷了同法國及俄國的類似實踐，但儘管有共同之處，其發展經驗應該仍然不同於法國及俄國。

中華帝國的歷史、中國的共產主義制度和毛澤東的一系列的革命嘗試，表明中國革命是這類普世主義帝國類型的第三次大革命。為追求更多的平等，歷次的革命都採用強制的平等正義，由於歷次都未達到平等的目的，因而革命便日益趨於激進。這種類型的革命得益於一些帝國取向的民族特點，而革命又反過來加強這些特點。

陳彥 譯

註釋

① 瓦爾密(Valmy)戰役(1792年9月)，法軍擊退入侵的普魯士軍隊，成為法蘭西共和勝利的象徵——譯註。